名家阅读(87)

重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最近,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炒得火热,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不过大多数人似乎是在人云亦云地看热闹,公众乃至学者对这本书的讨论只是停留在表面,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误读。比如有人竟然说法国革命前夕和中国目前一样,房地产泡沫也很严重。其实托克维尔根本就没提到这个问题,他那个年代也许压根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是提到了法国土地的碎片化,即土地因为历代继承分割得越来越小,致使私人土地最终无法承载独立的生计。这有点像中国农村,因为家庭人口不断增加,承包土地面积越来越小。但是法国革命无论和中国革命还是中国当下都是很不一样的,不能用我们当代面临的问题想当然地去套18世纪的法国。我看许多人的评论,应该是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就跟着起哄,至少是没有读完,也许只读了一个目录或摘要。这种风气是很让人忧心的,因为它很说明一个民族的素质。如果连白纸黑字摆在那里的东西都读不懂,那我们还能把什么做好呢?幸好托克维尔写的是本好书,以讹传讹害处有限。前几年国内盛传纳粹法学家施密特的著述,我看很多人也是没有怎么读过他的原作(或许只读了别人的评论)就在那里跟着叫好。把糟粕当精华,这当然要比误读托克维尔更危险。

《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值得深入挖掘。这本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公众期望攀升律,有人称之为"托克维尔定律"。这是大家都已关注到的,无需赘述。托克维尔是反经济决定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和韦伯一样都对长期受僵化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读者有所启示。原来一个社会是否发生革命或暴乱,不一定是在它经济最糟糕或社会最压抑的时候。相反,恰恰在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反而容易发生革命,因为社会期望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实际生活的改善,而人民有了一定的思考和行动自由。

二是"治权特权合一律"。托克维尔比较了英法两国,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如果享受特权的精英同时也掌握实际统治权,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如果两者发生割裂,就容易发生革命。严格地讲,英国不是完全没有革命,但总的来说历史演化比较延续,而法国却发生了大革命。为什么?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英国由贵族统治,同时贵族享受着特权。相反,法国贵族有特权而无治权,他们在大革命之前已经很长时间不履行治理社会的职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法国贵族之所以非常看重自己特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统治权,所以把特权看作是丧失治权的一种补偿,但是在老百姓看来,这帮人什么都不干,却在那里养尊处优,社会不公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描写的当年法国贵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众矢之的。

以上两点都容易产生一些误读。既然改革让公众期望不断攀升,是不是不改革反而江山永固?如果没有改革,人们就没有期望,没有期望不就不会发生革命了?既然治权特权统一有助于社会稳定,是不是统治者把权力牢牢抓在手里就万事大吉?这显然不是《旧体制与大革命》的结论。凡是在改革之前三十年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中国不存在改或不改的选项。改革是不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不改革情况可能会更糟。随着改革的进行,公众期望攀升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社会不满酿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风潮。至于治权特权合一论,托克维尔是想说英国贵族比较明智,希望通过一种开明统治来永久维持自己的特权。英国贵族知道自己只能在适当治理社会的前提下享受特权,而这种特权又不能过于招摇,还必须适当照顾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有时不得不牺牲部分特权。如果比较英国中世纪到18世纪的税收变化,会发现英国税收后来实际上是对穷人有好处的。

当然,托克维尔的解释可能夸大了两国贵族的差异。善治完全取决于贵族的自律或觉悟,恐怕也不太现实。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民主化,市民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从而产生对自己更有利的税制。托克维尔也注意到,税赋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不同体制的结果截然不同。民主体制的税赋必然是对大多数人或者穷人有利,必然会加重对富人的征税,就像今天的美国或者欧洲的情况一样,富人都叫苦不迭,都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但多数人受益是民主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多数一般来说是穷人,至多是中产阶级。专制社会则恰好相反,国家决策永远是让少数既得利益者受益,税负当然不例外。大革命前的法国就是这种情况,税收分配是越来越有利于富人,两极分化愈加严重。

"社会期望攀升律"和"治权特权合一律"虽然富于启示,却并非《旧体制与大革命》所要论证的重点。托克维尔真正想要着力论证的是第三点,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根子在于中央集权专制。"大独裁者"路易十四众人皆知,但作者的雄心是要追根求源,找到法兰西文明的集权文化基因。他最终因为身体等原因,并未完成这一自我赋予的使命,但书中已经揭示了路易十四之前的种种集权主义端倪。托克维尔致力论证,中央集权是万恶之源;它导致法国社会严重割裂,而社会割裂正是革命的前兆。他花了很大篇幅论证法国社会的割裂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贵族、平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路人。在他笔下,当时的法国已经变成一个各自为政的社会,每个人只想着怎么去得到更多的特权和好处。法国贵族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变本加厉地为自己捞好处,很容易遭到社会底层的憎恨。税收体制之所以在大革命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就是因为贵族等富裕阶层都只想着自己从这个国家得到好处,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以前在封建体制下过着一种贫困但有保障的生活,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大锅饭"时代。到了18世纪工业化革命以后,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而且基本生计、教育越来越得不到保障。这样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越来越没有共同利益、交往和相互同情,造成彼此不能相互理解、共同生活的局面。这种局面本来是集权体制造成的,现在反过来加固集权专制。一个严重割裂的社会不能自治,只有依靠一个更加集权的政府来统治社会。

托克维尔还探讨了政治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国早先是比较自由的,但到了后期因为中央集权加剧而变得越来越不自由。这导致各个阶层之间不能相互沟通,进而阶层割裂和相互仇恨埋下了隐患。一旦国家陷入这种困境,就特别容易发生革命。如果说专制体制最害怕革命,那么它也最容易产生革命。专制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为其茁壮成长供应肥沃的土壤和养分,最后收获革命的苦果。

在我看来,《旧体制与大革命》最重要的启示恰恰是以上第三点,也就是集权体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危险。革命容易在专制社会中发生,尤其容易在法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发生。这是托克维尔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为人忽视的一点。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从章太炎、章士钊趋赶时髦说起

■杨天宏

现代社会讲究多元,道理就像吃饭穿衣需要变换花样一样简单。天天享用同一食物,即便是山珍海味,也会厌食,故须更改饮食种类。而各式"时装"层出不穷,推陈出新,则印证了"衣不如新"的民谚和时俗。饮食衣着如此,学术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学者们似乎不太明白这样的道理,他们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一味追求"高深",排斥"通俗",把精心炮制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得懂的学术著作比作《三国志》,而将大众喜闻乐道的文字比作《三国演义》,认为作演义体文字不过是处于文人底层的"小说家流"的谋生手段,作这类文字的人不但不能侧身"儒林",甚至不能进入"文苑"。这种观念长期存在于学者头脑中,中国的文字作品也因此出现"文野"之分、"雅俗"之别。

但新文化运动标榜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开始打破旧式文人对文字作品的垄断,文人墨客与世隔绝、孤芳自赏的状态也有所改变。

近代中国在文字创作上坚持传统立场的学者中,有两个姓章的学者格外引人瞩目。一个是章太炎。太炎先生博古通今,学问文章在近代学者中堪称翘楚,因投身反清革命,写了很多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政论文字,传扬宇内,备受赞誉,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然而章太炎对他人看好的作品并不以为然。他在给邓实的信中说,自己的文章为雅俗共知并称道者,只有讨论时势的数篇,但这些文章过于浅显,文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而所作《▮书》,博而有约,文不掩质,是真正可以传世的文字,反倒不被时人关注。对此,章太炎深感遗憾。基于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立场,他曾对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走通俗路线的学者提出尖锐批评,说梁启超如果不自恃才高,而循其少时所受严格训练写作,文章当不至如此"滥恶"。他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俞樾也颇有微词,说他"吐辞冗滥",原因在于喜欢趋附庸俗化的"时尚",下笔时又无文辞方面的讲究。

但是,即便章太炎这样有资格"守旧"的传统文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也不能不趋赶时髦,在摹拟魏晋风格古文做高深学问的同时,也对白话文及白话作品展开研究。因为自己有研究,所以对新文化人自称是白话文的开创者不以为然。有一次刘半农问章太炎对白话文的看法,章回答说,白话文并不是今天才有,《诗经》就是白话诗,历朝历代的小说,如《水浒》、《老残游记》等,都是用当时的通俗语言甚至方言写成,现在的白话文鼓吹者似乎不知道这一点,而自以为开风气之先,岂非笑话?不仅如此,章太炎偶尔还用白话文写作。1910年,他在《教育今语》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其中一段涉及日本的文字,十分直白,丝毫不亚于后来白话文运动中的白话:"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中国下等人,相信《三国演义》里头许多怪怪奇奇的事,当做真实,但在略读书的人,不过付之一笑。日本人竟把小说的鬼话,踵事增华,当做真正事实,好笑极了。因为日本史学,本来不昌,就是他国正史,也大半从小说传闻的话翻来。所以前人假造一种小说,后来人竟当做真历史。这种笑柄,千万不要风行到中国才好。……弃人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士钊曾到英国留学,受过逻辑学训练,强调下笔之时,"遣词造句皆循定律",但为文直追韩(愈)、柳(宗元),有复古倾向。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反其道而行,试图革新古文,1925年出任教育总长之后甚至禁止学生读写白话文,被视为白话文最顽固的反对派。但就是这样的人物,思想行为也常变通,并不古板。1925年2月章士钊与胡适邂逅合影,相约在照片上各题一首诗,以作纪念。有意思的是,主张白话的胡适题赠的诗多少有些讲究格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主张古文的章士钊反倒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白话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诗虽写得蹩脚,却反映了章氏思想的开通与性格的诙谐。

我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是想说明,在多元化的语境下,学者应该明白"高处不胜寒"及"曲高和寡"的道理,不必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至少不应自以为高明,排斥通俗的文字作品。原因很简单,社会对学术文化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样态的,曲径通幽的纯学术著作有它的价值,简单明了的大众读物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生活在传统文化浓重氛围中的二章(太炎、士钊)尚且能因应时代变化,适度接受通俗,今天的学者还有什么理由将自己置于大众文化的对立面呢?

本书题名《新说中国近代史》,作者是一位正在攻读学位的80后硕士研究生,他学习勤勉,阅读宽泛,思想新锐,文笔通顺。因为阅历与视角不同,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新说"可能包含很多成长中的不成熟,但可能也包含不少专业历史学者所没有的观察和见解。正像不少历史学者的启蒙历史著作不是诸如"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而是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一样,谁又能说类似"新说"这样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不会在历史研究的圈子外引起非专业人士对历史的兴趣,并在近代史"新说"激发起的兴趣支配下去寻求近代历史的"真说"呢?

(《新说中国近代史》,黄磊著,中国工人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为本书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隋炀帝与《文选》学

■顾 农

隋炀帝是一个大大挨骂的亡国之君,《文选》学是一门千古不衰的显学,两者之间似无关系;而其实不然。

《文选》学实即起步于隋炀帝时代。这里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萧梁皇室中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一支的后裔在隋代颇为活跃。萧统英年早逝后,梁武帝萧衍(464~549)没有立皇太孙为接班人,而是安排萧统的弟弟萧纲(503~551)接班(后来称为梁简文帝);侯景之乱中萧衍、萧纲先后死难,萧统的七弟萧绎(508~555)在江陵称帝(后来称为梁元帝),当时领兵坐镇襄阳的萧统之子萧▮(519~562)与萧绎不和,他的弟弟萧誉又被萧绎杀了,于是称藩于西魏,引西魏军攻下了江陵,梁朝算是灭亡了。西魏立萧▮为后梁主(宣帝),从此后梁就在北方政权(西魏、北周、隋)的监控下传了三代,这就是宣帝萧▮、明帝萧岿(542~585)和末主萧琮(?~607?)。这后两位二级皇帝的传记均在《隋书》中。隋高祖杨坚同萧岿关系非常好,特别安排将萧岿的女儿嫁给次子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萧妃被立为皇后,《隋书·后妃传》称她"有智识,好学,解属文",传中附载了她的一篇《述志赋》,水平很高,可谓不坠家风。

既然当今皇帝同后梁明帝萧岿成了儿女亲家,则萧岿先祖萧统编选的《文选》也就受到很大的重视,当时科举考试中已多用《文选》中的选文作为试题,例如据《北史·杜铨传》可知,开皇十五年(595)杜正玄举秀才,杨素试之以拟《上林赋》、《圣主得贤臣颂》、《燕然山铭》、《剑阁铭》;开皇十六年(596)杜正藏举秀才,苏威试之以拟《过秦论》等等——这些作为典范的原文均曾选入《文选》。这应当不是偶然的。于是注意研究《文选》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

到炀帝登基后,这一支萧家作为外戚得到很多特殊的照顾,《文选》的研究也进一步繁荣起来。率先从事《文选》研究者有两个值得纪念的人物,一是萧该,一是曹宪。《隋书·儒林传》载:"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萧恢之孙也……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该的《汉书音义》十二卷、《文选音义》(或省称《文选音》)十卷均应作于炀帝时代(《隋书·儒林传》载包恺"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该)、包(恺)二人为宗匠。"然则萧该的著作亦当完成于大业中);后者开《文选》学之先河,意义是很大的。按梁鄱阳王萧恢是梁武帝萧衍(464~549)的弟弟,萧该乃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堂侄,他出马来研究《文选》,自然有些家族的感情在起作用,同时应当也是受到此时大气候的鼓舞。

另一个研究《文选》学的人物是著名的扬州学者曹宪(545?~649?),此人是一位老寿星,一生经历四朝,生于萧梁,渐历陈、隋,晚年入唐,所以《隋书》没有替他立传;但他事业的高峰正在隋炀帝时代,《旧唐书·儒学传》云:

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宪又善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曹宪中年入隋后才开始出仕,很可能是由扬州总管、晋王杨广请出山的。清儒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一文(《▮经室二集》卷二)有云:"扬州旧城文选楼、文选巷,考古者以为即曹宪故宅,《嘉靖图志》所称'文选巷'者也。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于扬州载文选楼,注引旧《图经》云'文选巷,即其处也。炀帝尝幸焉。'"由此颇可推知曹宪当时的声望之高。

《文选》学发源于隋而大盛于唐,《文选》学的两大先驱——萧该和曹宪都活跃于炀帝时代,受到过那个时代氛围的影响;重视培养后学的曹宪更可以说是文选学的开山祖师,而隋炀帝实为其背后的推手之一。

由帝王、太子、藩王或其他特权人物为中心,形成一个个文化精英的集团或圈子,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史、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就中古时代而言,赫赫有名的建安七子、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而梁代的萧衍、萧统、萧纲、萧绎身边各有一大批知识精英,更为隋炀帝杨广树立了切近的榜样。由于杨广晚年为政荒谬,把政权给弄丢了,他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略。本文就他与《文选》学的关系略述所见,希望能起到一点拾遗备忘的作用。

"真理"的反义词,是"清楚"

(上接第9版)

戈革自己曾说,他有两个假想敌:日本和俄国。日本和俄国是翻译大国,任何领域的重要著作,都会被这两个国家迅速译出。他原以为,对于《玻尔集》这样的重要著作,这两个国家必然会组织各自的翻译团队,同步翻译出版。所以他说,要以一人之力迎战两支优秀的团队。显然,戈革先生遥遥领先。

戈革自称,他是全世界阅读玻尔文字最多的人。在丹麦,《玻尔集》一卷一卷地出,在中国,戈革一卷一卷地译。《玻尔集》前后有三任主编,每卷都另有编辑,没有人有必要通读全书。但是作为中文译者,戈革必须逐字逐句阅读全部文字。

2001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戈革先生"丹麦国旗骑士勋章"。戈革先生自称有了骑士头衔。此前还有两位翻译家得到过这个荣誉,就是翻译安徒生的叶君健和林桦。

戈革的工作受到了玻尔祖国的褒奖,在自己的国家则长期受到冷遇。前十卷《玻尔集》换了几家出版社,都要靠戈革拉赞助才能出版。

三十多年来我常常想,我花了这么多精力,这么多时间,受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冷淡和污蔑来翻译这十二卷《尼耳斯·玻尔集》,到底"图的"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自己除了追求个"充实自己"以外,也不过是一点"留赠后人"的指望而已。(《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91页)

在这个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出版全套《玻尔集》,可谓壮举。戈革先生"留赠后人"之夙愿得偿,他的在天之灵,必能笑出声来。

戈革先生是科学史圈里的奇人趣人,一生坎坷,一身才华,一辈子牢骚。著译等身,有千万字之多。虽然是科学史教授,却如古时文人一般,写古诗,画水墨,工篆刻。曾为金庸的每个人物刻一枚章,光是石头就堆了一桌子。他应该也是最早的金庸研究者,不过,所著《挑灯看剑话金庸》,也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多年来学界对戈革先生的牢骚多有微词,现在戈革先生安息了。缺少了戈革牢骚的学界,似乎也缺少了一些趣味呢!

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套《玻尔集》还有一点儿瑕疵。

首先,应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说明,代表华师大出版社,大致说明出版此书的过程,以及此前的出版情况,比如前面已经出版的各卷,分别在哪一年由哪些出版社出版。另外,译者已经仙去,谁来对译稿负全责,也该有个说明。

其次,《玻尔集》第十二卷卷末,有一个戈革小传,但是没有小传作者的名字,令人疑惑。如果作者不愿意署名,哪怕署一个笔名也好。

最后,这一点工作量比较大,但是对于出版社来说,却是必要的。既然全套十二卷由一家出版社完整出版,除了装帧统一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比如,应该对全书做统一的编校工作。

在几十年的翻译过程中,戈革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译后记中,戈革说到了他对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解,也说到了一些词的译法。比如,"英国皇家学会",英国君主是国王,不是皇帝,译为皇家不妥,只是皇家学会这个名称流传已久,不宜更改。但是,类似于"丹麦皇家学会"这样的译法,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戈革后来译为"丹麦王国科学-文学院"。既然如此,戈革前期翻译成"丹麦皇家学院"的那些地方,应该统一改成"丹麦王国科学-文学院"比较合适。

再如,关于"论"字,戈革先生也做了辨析。认为中文的"论",对应的英文应该是"-ism"。所以quantum theory应该翻译成"量子理论",不应译作"量子论"。如此,应该把前几卷中将quantum theory翻译成"量子论"的地方,统一改为"量子理论"才符合戈革的意愿。

但是,华师大目前这个版本,并未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没有一个代表华师大的说明,不知道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有别的考虑。

这部巨著,不仅对于物理学家有丰富的营养,对于人文学者,具有同样的乃至更加丰富的意义。

玻尔的思想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我们对他的深刻、深邃与深远,几乎还没有意识到。